◆军事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

□曲爱国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共进行了 13 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军队领导管理和作战指挥体制，完成了由单一陆军向诸军种合成军队的转变，而且适应机械化、信息化战争的发展需要，不断进行结构优化，有力地保障了军队现代化进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回顾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历史，对于贯彻落实《决定》的战略部署，实现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1975 年，在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以解决“肿”“散”“骄”“奢”“惰”问题为核心，以战备工作为牵引，全面整顿军队。消“肿”治“臃”，调整结构，是整顿的重要内容。根据军委的决定，我军重新确定了陆军军和步兵师编制，精简机关，裁并机构，安排超编干部，剥离军队编制内的地方部门，削减保障部队，撤销部分建制部队。虽然这次整顿因错误地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一度中断，但粉碎“四人帮”后恢复进行，并在拨乱反正运动中强力推进。到 70 年代末，全军总员额下降到 510 余万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2 年 12 月，全国人大通过第四部宪法，确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党的军事领导体制和国家军事领导体制完全一体化。邓小平提出了把我军建设成为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军队建设总目标。我军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继续展开以“消肿”为重点的体制编制调整，连续进行两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铁道兵、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撤销了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三个兵种，大批撤销生产建设部队，将部分内卫和警卫任务转属新组建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军裁减员额 160 万余人。同时，改革国防动员体制，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组建预备役部队。军队建设方向重新回到精简数量、提高质量的正确轨道，面貌开始改变。

1985 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施战略性转变，由“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全面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随后又确定了由准备进行全面的反侵略战争转向准备打赢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战略指导。邓小平重新摆正军队建设中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指出：从总体上看，我军所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部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以前“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现在改变了，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我军按照“精兵、高效、合成”的标准，坚决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进行了百万大裁军为核心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共撤销 4 个大军区、31 个军级单位和 4054 个师团级单位，使军队总员额降到了 300 万左右。到 1990 年，全军总员额减到 319.9 万人。同时，对陆军体制编制和结构作出重大调整。在 80 年代前期组建机械化师和进行机械化合成集团军试点的基础上，组建合成集团军，将装甲兵、炮兵和野战防空兵、工程兵、防化学兵等编入集团军序列，组建陆军航空兵，形成了以装甲兵、步兵组成的地面突击力量，以炮兵、防空兵、陆军航空兵组成的火力支援力量，以特种兵、通信兵、工程兵、防化学兵、气象兵和电子对抗分队组成的作战保障力量，以运输、修理、管线、卫生、军需等专业分队组成的后勤保障力量，从体制编制上解决了陆军诸兵种合成问题，迈出由摩托化向机械化跃升的关键一步。

（二）

1991 年，海湾战争爆发。这场被称作机械化战争“绝唱”、信息化战争“开端”的战争，对我军现代化建设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此后几年，以信息化为特征的新军事变革风起云涌。我军建设如何应对挑战，紧跟世界军事发展，加速实现军队转型，确保打得赢，面临着严峻挑战。1993 年 1 月，在江泽民的主持下，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明确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定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由此开始，我军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内容和思路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贯彻“科技强军”战略，体制编制调整改革遵循“压缩规模、优化结构、理顺关系”的原则，强调依靠科技进步提高部队战斗力和加快军队建设，强调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着力调整作战力量结构，着力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全面展开现代化转型。

根据中央军委确定的国防和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与机械化为基础、信息化为主导的复合式发展思路，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围绕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这一主题展开。由单一军种为主的协同式联合作战向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转变，由以陆军为主体的国土防御型军队向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攻防兼备型军队转变，由以陆军为重点的合成军队发展模式向以海军、空军、二炮为重点的诸军兵种协调发展的模式转变，以组织结构调整和指挥体制改革为重点，着力建立和完善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机构精干、指挥灵便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陆军部分集团军开始实行军－旅－营建制，逐步推进部队编成向小型化、模块化、多能化方向发展；空军、海军作战部队改由军区空军或舰队直接指挥，技术含量较高部队的比例提高。同时，进一步完善领导管理体制，成立总装备部，实现了全军主要武器装备的集中统管，加强了武器装备建设的统一领导和全系统、全寿命管理；建立以军区为基础，区域保障与建制保障相结合、统供保障与专供保障相结合的联勤保障体制。这一期间，全军两次裁减员额，使军队总规模保持在 230 万人。

（三）

进入新世纪，中央军委进一步充实完善新时期战略方针，确定把军事斗争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并确定了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建设目标。胡锦涛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军队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使命。

按照履行使命任务和信息化建设的要求，我军在体制编制调整中，突出了联合作战体系建设的主题，把优化结构、理顺关系作为重点内容，强化军委总部战略管理功能，组建战略规划部，改编设立了总参信息化部和军训部。按照推进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优化各军兵种规模结构、改革部队编组模式的思路，突出陆上群队、海上编队和空中编队建设，逐步提高部队模块化编组和合成化使用水平，努力形成三军联合、体系健全、机制完善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精干、联合、多能、高效的作战力量体系。陆军部队按照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加强数字化部队等新型力量建设，优化部队编成结构，积极推进由区域防卫型向全域机动型转变；海军按照近海防御的战略要求，形成由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航空兵、陆战队和岸防部队等组成的作战力量体系；空军按照攻守兼备的战略要求，加强以侦察预警、空中进攻、防空反导、战略投送为重点的作战力量体系建设；第二炮兵按照核常兼备、精干有效的原则，提高快速反应、有效突防、精确打击、综合毁伤和生存防护能力构成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从而在体制编制上，顺应了世界军队的发展潮流，体现出了现代军队的编组特征，为军队的转型创造了条件。

（四）

军队体制编制与使命任务变化、作战思想更新、武器装备发展相适应，是军队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既是武装力量管理方法和作战力量体系编组思路的体现，也是提升军队战斗力、引领军队现代化发展的措施。回顾“文革”后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始终围绕党所确定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目标任务而展开，始终围绕军事战略方针的贯彻落实而展开，始终围绕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而展开，始终围绕构建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军事力量体系而展开。

党的十八大确定：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方案，把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作为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明确了推进军队领导管理体制改革、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完善新型作战力量领导体制、加强信息化建设集中统管和优化军队规模结构、调整各种比例关系、按照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等任务。这些任务和措施，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更是直面现实、着眼未来，通过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提升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确保我军能打现代战争、打赢现代战争的根本举措。通过新一轮的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必将进一步清除障碍、理顺关系，固化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的成就，实现军队体制编制和力量结构的一次根本性变革，牵引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一次新的飞跃，为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宏伟蓝图、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军队建设

目标中心战催生联合部队

□王雪平

信息时代的中小规模冲突将主要围绕目标展开

机械化条件下的战争，由于战争目的的攻城略地，所以大空间、大纵深、宽正面交战是基本模式，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多少成为衡量战争胜负的重要标志。信息时代，占领领土、攻城略地的“绞人机”式战争将很难发生，取而代之的是围绕利益或重要目标展开的有限规模与可控的局部冲突，其表现形式是目标中心战。

所谓目标中心战，即以目标为中心组织的作战，是按照军事目标学原理，着眼快速高效达成作战目的，围绕目标打击与占控进行的作战决策、作战行动。其实质是通过对目标关节点的打击，削弱敌目标体系聚合力，达到快速瘫痪或挖解对手作战体系的目的，或通过对关键目标施压，削弱对方抵抗意志，达到“小战或‘局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战役目的。军事冲突围绕利益或重要目标展开，一方面是战争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以往的战争中，交战双方主要是以攻城略地为目的，这种作战目的决定了战争必须在广阔空间实施、大量杀伤敌有生力量，才能征服敌人的意志和占领对手的领土。现代条件下，无论你的军队如何强大，技术如何先进，要想通过大规模的战争，占领一国领土已不大可能，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对敌方支撑作战系统运转关节点的瘫痪性攻击，迫使对方按照己方条件结束战争，所以，围绕利益目标展开有限规模作战成为现代武装冲突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是军事科技的快速发展为目标中心战提供了可能。打得准、毁伤效果好、随带伤亡小，是目标中心的本质要求。信息化条件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军事科技及其高新武器装备的“井喷式”发展，为目标中心战有效实施提供了物质平台。伊拉克战争中，美、英联军使用精确制导导弹占弹药总量的 80%以上。

目标中心战对部队作战能力提出新要求

目标中心战的目标既有大目标，也有小目标，可能是一座城市，也可能是一个岛屿。围绕这种特定目标展开的攻击，对部队作战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一是立体机动能力。目标中心战作战行动，改变了传统的梯队式兵力部署，先前沿后纵深，层层剥皮推进的交战方式，强调围绕目标非线式、跳跃式、垂直式攻击，要求部队必须具有沿地面、地平线、空中立体机动的能力，能从不同方向、不同高度、不同维度，对目标实施“手抓”式打击。二是高效指挥能力。传统作战指挥决策注重选择主攻方向和突破口，按作战阶段逐次投入作战力量，目标中心战指挥则强调选择主要目标、研究毁伤方法、注重评估目标毁伤效果，指挥重心由兵力部署向毁伤目标转变，指挥对象由单一兵种向联合力量转变，要求部队必须立体指挥、多方式指挥、直盯目标指挥，确保作战目的的快速达成。三是无缝协同能力。传统作战，由于开进、接敌、攻击、占领等阶段的明显性，所以协同通常按时节组织实施。目标中心战，战役战斗紧紧围绕目标展开，部队行动没有明显的阶段和先后之分，要求部队必须具备节点协同、临机协同、自主协同、精确协同等多方式协同的能力，确保攻击行动千装联动、万人一体。四是多维攻击能力。传统作战打得是过程，强调积小胜为大胜。目标中心战改变了传统作战叠加的制胜方式，突出一锤定音的目标斩首或瘫痪攻击，要求部队必须具有从空中、陆上、海上，甚至水下、高空、无形空间，对目标实施多维立体“手抓”式攻击的能力。五是环形保障能力。传统作战阶段非常明显，保障一般按照作战阶段组织实施。目标中心战，紧紧围绕目标展开，保障由传统的线式、点式变为“椭圆”式，要求部队必须具有立体保障的能力，能紧紧围绕攻击目标环形立体保障。

建设多功能于一体的联合部队势在必行

信息时代的作战强调体系对抗，任何一个军兵种都不可能独立完成作战任务，目标中心战更是如此。所以，打造适应目标中心战需要的联合部队是应对之策，这也是从组织体制上为打赢目标中心战量身定衣。一是构想联合部队编制。目标大小、强度是联合部队建设规模的依据。根据军事斗争准备需要，联合部队的级别可定为副大军区级，也可定为正军级。美军组建的联合远征部队包括陆军师、海军航母战斗群、海军陆战队部（分）队和空军战斗机联队；俄军组建的机动部队横跨 3 个军种和 1 个独立兵种，包括陆军的摩步师、坦克师、特种旅、火箭旅，空军的战斗机、强击机、轰炸机团，海军的陆战队营和空降兵的空降师；法国组建的快速反应部队由 5 个军兵种的不同类型师组成。二是打造一体化联合装备。这是联合部队的标志性装备，也是实现军种融合的武器平台。如美军的“独立号”隐形战舰，融反潜、扫雷、监视、侦察和兵力部署综合功能于一体，可载 3 架直升机、特种部队和装甲车，舰载炮可对空中、陆地和水下目标发射导弹，从装备上实现了陆、海、空三军于一体。适应目标中心战需要，我军应加快海上一体化装备的研发力度，为可能爆发的海上目标中心战尽早准备。

◆战例启示录

从威海之战看中日安全战略博弈

□王 勇

今年是甲午战争 120 周年，然而，在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上任仅一年的安倍却频频出招：接连批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和《统合机动防卫力量构想》等日本今后 10 年的“外交和安保战略指针”，明确把中国列为主要威胁和作战对象；明目张胆地到“靖国神社”拜鬼，以“汇报执政业绩”来极力召唤军国主义的亡灵，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社会秩序；建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打造战争“小核心”战时内阁，并强行出台《特定秘密保护法案》，为秘密进行战争决策提供法律掩护；大幅度提升国防预算，并增兵西南诸岛，加紧进行针对中国的作战部署……诸多因素预示着，安倍政权正将日本带向一种与中国全面对抗的道路，并将给地区安全和经济繁荣带来极大的威胁。在分析中日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及其影响时，不免让我想起了甲午战争中的威海之战。它是一系列关键性战役的收官之战，不仅反映了中日早期海权之争的结局，更记载了120年前中日发生大碰撞之后，中国历史发展轨迹和地区格局的重大变化。

貌似强大的北洋海军在甲午年“大考”中露馅

国务院曾经在甲午战争 100 周年之际，将当年的主战场，建有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刘公岛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一个东西长约 3 公里，南北宽约 1 公里，总面积约 3.15 平方公里的中国内海岛屿，史书称它为威海卫的“东隅屏藩”。其以“水深不冻，山列屏障，路断腹地，土无厚淤，口接大洋，地处海中”而颇受关注，成为北洋水师的基地。

据有关史料记载，1888 年 12 月 7 日，北洋海军在刘公岛正式成军，随后发展到拥有大小军舰数十艘（有资料称 65 艘），不仅位列当时亚洲的首位，在世界上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据称实力位居世界第 8 位）。然而，在 6 年之后迎来的甲午战争“大考”之中，这支中国当年最得意的海上力量却没能及格。1894 年 9 月 17 日，中日黄海大东沟一战，北洋舰队败北；1895 年 1 月初，坚守威海卫的北洋水师被迫进入了关键性的最后决战，可结果却令国人大失所望。

陆上协同失调，威海卫防御未挽败局

尽管北洋舰队先前几次海战失利损失巨大，但在进行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最后决战前，仍保有一定的实力。其中，仅威海卫港内就保有各种舰艇 26 艘，再加上陆上设防的众多炮台和防御力量，只要齐心协力，配合得当，本应能够有效阻止日军的“最后疯狂”。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1895 年 1 月 20 日，日军海陆并进，对中国守军实施了早期的陆海联合作战。担任日军登陆作战的，主要是由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 2 军，共 2.5 万人左右。其中，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指挥的第 2 师团，以及黑木为桢中将指挥的第 6 师团。日军登陆部队在其水面舰艇的掩护下，几经激战后于 23 日便在荣成龙须岛完成了全部登陆。

1 月 30 日，日军开始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的南帮炮台。当时，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有 6 营 3000 余人。他们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在营官周家恩的带领下，坚守摩天岭等阵地，以英勇顽强的抵御给予了日军以较大杀伤，包括击毙了担任日军左翼司令官的大寺安纯少将。然而，由于力量过于悬殊，清军最终没能守住南帮炮台。而就在威海的南帮炮台激战之际，清军在烟台及其以东还部署有 30 多营，但这些力量却没有及时投入救援，原因在于，南北帮炮台及刘公岛的守军主要听命于李鸿章。显然，这种由清廷高层揽权造成的内部矛盾，影响到了战时力量的协调与配合，也导致了战局的不利发展。

大本营被占，北洋海军由此没落

南帮炮台失陷后，威海形势变得十分危急，可当时负有防守威海重要责任的李秉衡却为了一己之利，对威海战事的发展漠不关心，仅派部分兵力扼守威海西路。因未及时增兵巩固阵地，威海之战的天平日渐偏向进攻的日军，至 2 月 3 日，日军便攻占了威海卫城。随着威海的陆地悉被日军占据，当时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已成为一座孤岛。继而，日军水陆两路配合，先后向刘公岛和威海港内的北洋舰队发动了不下七八次的攻击，但均被坚守的清军击退。在此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曾经致书丁汝昌，劝他投降，却被他断然拒绝。

战至 2 月 5 日凌晨，清军的旗舰“定远”中雷搁浅，后被当作“水炮台”使用，继续与日军作殊死搏战。可仅 2 天后，李秉衡竟然听信鱼雷艇管带王登云谎报的军情，弃威海于不顾而至莱州。此后，眼见形势进一步恶化，负有更高责任的李鸿章竟然也放弃了指挥威海保卫战的责任。这种指挥上的失职，无疑加速了这场战役失败和北洋舰队覆灭的进程。

2 月 10 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随后自杀殉职。11 日，丁汝昌在美籍“洋督察”浩威，以及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随后接任的“镇远”管带杨用霖，也因不愿受降而自杀殉国。12 日，浩威起草了投降书，并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2 天后，牛昶昞与日本占领者伊东祐亨，签订了《刘公岛降约》。其中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7 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使寄托着中华民族强国梦的希望化为千古遗恨!

本可挽回败局的机会被浪费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史料就不难发现，其实清军本可以有机会挽回败局，下面即是众多机会中的两个。

机会之一：假如能够集中其他海上力量共同对敌。其实，清军除北洋舰队外，另外还有南洋、福建和广东 3 支舰队。可当时的海军衙门及至兼有“最高指挥官”职责的李鸿章，却不能统帅与号令各舰队并使之集中对敌。据史料记载，黄海海战后，清政府曾电令南洋大臣刘坤一，“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但其却回电强调许多理由拒绝派船北上；而在金州失守旅顺告急时，清政府又曾电令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张之洞，让他“派南洋四舰前来助剿”，可张之洞也和刘坤一样，拒绝派船增援；后来，北洋海军还要求把广东海军的 2 艘大型鱼雷艇调到北洋助战，广东海军却以“艇中存煤远行不敷烧用”为理由同样加以拒绝。且不说这另外 3 支海上力量均能服从号令，在威海保卫战期间，当日海军主力全部集中于山东半岛与北洋舰队进行激战之机，只要南洋舰队能北上山东半岛增援，便能对攻击威海的日本海上力量形成夹击，或造成一种威慑态势，以分散日舰注意力并减轻北洋舰队承受的压力。

机会之二：假如北洋海军能够主动出击或撤离。诚然，在威海卫之战中，陆路失守是导致局势陷于被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却不致造成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海军作为海上的机动力量，本不应全部集结于狭小的威海附近守株待兔。只要能够机动到外围寻求日军弱点先机发力，或者在南北帮炮台失守且舰队尚无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及时组织突围，向烟台或吴淞方向撤离，则将有机会保存有生力量等待重整旗鼓。

历史留下的警示：决不能再让敌人打第二枪

威海之战的败北不仅留下了 120 年来中国的遗恨，更带给了我们诸多的警示。

军队建设战略上应有明确的目标并着眼实战。当时的北洋水师建设并无明确的战略目标，虽然购来了以“定远”“镇远”（均为 7400 吨）为代表的铁甲主力舰，却只是为了“守海口”“保和局”，“本无驰骋域外之意”。而且，还忽视了对当时已经崭露头角的“海上机动战”研究，以至于在交战中陷于被动挨打局面。显然，现代海上力量的建设，必须要根据“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目标，以及应对国家面对海上安全挑战的实战要求去发展。

高级决策与指挥人员须着眼全局并积极控制危机。当时的清政府高层及其北洋水师中，虽然也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中日即将发生重大军事危机，但却没有从全局上加以运筹，采取有效的危机防范措施，而是被动地等待危机来临；当处战时，他们又只顾当面情况，不讲整体协调，或“避战保船”或“盲目迎战”，以至于在无充分准备的海上决战中落败。当下，虽然中日的国力、军力已经不能与 120 多年前相提并论，但战略资源奇缺、经济结构脆弱、国家治理不力的日本，已经被安倍为代表的极右势力所挟持，甚至有部分人疯狂叫嚣要重温“甲午荣光”，战争冒险性日益增大，“中日必有一战”的预言正在变得越来越接近现实。我国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一切争端，坚持在战略上不打第一枪，但面对军国主义者强加的种种挑衅，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安全危机乃至战争应对准备，绝不让对手有机会向我打第二枪。

国家需凝聚内力以迎接一切安全挑战。分析史料后就不难发现，中国当年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与技术之差上，因为当时北洋海军拥有的舰船几乎是日本的两倍（中国实力位居世界第 8 位，而日本仅位居第 11 位）。真正的原因却是败在内部不和、组织的不完善与官员的腐败。中日开战之前，以慈禧为代表的“大老虎”们，就曾大肆挪用海军军费，造成了备战不实；战争打响以后，一些拥有实权的“主和派”不仅寄希望于俄、英、美等国出面调停，而且还暗中遣使到日本求和；即使一些主张派，也缺乏对广大民众的必要动员，因而难以抵御强敌的进攻。随着国防意识的增强，如今民众对日本在其右翼领导人带领下，正企图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推动军国主义复辟，对地区安全与经济繁荣造成的威胁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只要围绕对日斗争的大目标，正确引导民众，就能很好地凝聚内力，陷安倍政权的妄想于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